

编者按：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一个教育家层出不穷的国度。从孔子、孟子到朱熹、范仲淹，从严复、梁启超到蔡元培、陶行知，这一个个千古流芳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中国教育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也显示了中华文明曾经有过的荣耀。这些教育家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华文明史的稀世珍宝，也是人类教育史的宝贵财富。今日中国之教育，正在呼唤新一代教育家的成长；“让教育家来办教育”的呼声，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为此，本刊拟从本期起，开设“中国教育家研究”专栏，旨在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尤其是近现代教育家进行公正、客观的研究，以讲述其真故事，探求其真思想，总结其真经验，弘扬其真精神，存史鉴今，继往开来。

##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陈洪捷 蔡磊<sup>珂</sup>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

**摘 要：**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在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倡导和践行美育，为民國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作为校长，革新北大，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坚持学术独立的原则，为国家建立了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蔡元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与科学研究的建制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关键词：**蔡元培；美育；学术自由；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

**作者简介：**陈洪捷（1959—）男，陕西西安人，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比较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1-0096-09 **收稿日期：**2015-01-10

---

提及蔡元培，人们都不禁想起五四运动前后北大进行的改革。事实上，蔡元培政治地位和声望甚高，对中国近代在政治和教育上的影响均不可小觑，而他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尤其深远。他一生担任过许多公职，其中有三个重要职务：一是民国教育总长，二是北大校长，三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在这三个时期，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开了风气，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早逝，家境并不富裕。蔡元培从小学习勤奋，自强独立。

15岁（1883年）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补翰林院编修，可谓仕途不可限量。而此时的蔡元培开始留心西学，广泛涉猎西方科学与文化，寻求维新变法的道路，从一名传统的文人转变为改良派的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回乡投身教育事业，先后执掌绍郡中西学堂，执教南洋公学，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高瞻远瞩地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第一次将美育确立为国家的教育方

针，为现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半是西学东渐的时期，是西方的知识以及知识传授和生产体制逐步进入中国、中国固有的知识和教育体系逐渐退却的时期。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以大学为中心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框架基本定型。1916年底，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这场改革可以说从观念和学术制度层面真正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大学。蔡元培认为：“教育文化是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的基础。”1928年，在他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研究院，这标志着国家学术研究体制的形成。

### 一、中国美育的开拓者

辛亥革命的胜利彻底推翻了三百年满清政府的统治，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数千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结束。在此新旧交替之际，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为了顺应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他剔除了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的核心价值，提出了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及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年10月，美育被纳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第一次在法律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此，美育的价值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并得以与体育、智育、德育并列，被纳入中华民国新教育的价值体系之中。蔡元培一生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动美育的实践。

#### 1. 倡导美育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源自于康德美学，这与他德国留学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晚年曾回忆说：“我于讲台上既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sup>〔1〕457</sup>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外临强敌、内部动荡的困境，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也岌岌可危，维系中国数千年的伦理道德濒临崩溃。蔡元培认为美育是重塑社会价值体系的手段，他指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sup>〔2〕630</sup>

美育被蔡元培视为“近代教育之骨干”<sup>〔3〕133</sup>，

与他的教育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蔡元培缘何倡导美育？

其一，美育是蔡元培教育理想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蔡元培为民国确立教育方针时首先分析了君主时代与共和时代的教育的不同，他认为：“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而专制时代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sup>〔4〕177-178</sup>

为此，蔡元培确立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其中，军国主义即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尚武”，实利主义教育即“尚实”，公民道德教育接近“尚公”的意涵。但是剔除了前清“忠君、尊孔”的核心价值，因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sup>〔5〕9</sup>。蔡元培在上任伊始便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

蔡元培认为教育可以分为两类：“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sup>〔5〕9</sup>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属于前者，美育和世界观教育属于后者。它们的目的也截然不同，“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sup>〔5〕12</sup>。军国民、实利主义和公民道德教育是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的，而美育与世界观教育则超脱了“现世幸福”之局限。因此，蔡元培指出，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中，“惟世界观及美育，鄙人尤所注重”<sup>〔5〕16</sup>。

在蔡元培看来，教育不仅需要满足一定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而更为重要的是纯粹的教育理想，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曾具体阐释道，教育理想是为全人类尽义务，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人类之义务就是“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sup>〔6〕218</sup>。

可见,美育是蔡元培教育理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二,美育是实现蔡元培教育理想的重要途径。

1915年,蔡元培在万国教育会议的演讲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sup>[7]</sup>因此,道德的养成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

一个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人的培养有赖于美育。蔡元培在“美育”词条中阐释道:“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为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sup>[8]</sup>道德有不同的层次,而美育能够养成高尚道德。因此,健全人格的培养离不开美育。

蔡元培在《哲学大纲》一书中将道德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曰属于小己者;二曰属于社会者;三曰属于人道主义者。“属于小己者,一切行为皆以有裨于小己之生存者为有价值也。”“属于社会者,将小己意志同化于公共意志,以社会公众之幸福及公众之进步为目的。”“人道主义从狭义讲为全体人类,从广义讲,自动物而植物,以至于无机物,凡认为有识者,皆有相关之休戚。如是,则一切小己,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sup>[9]</sup>人道主义是最高层次的道德,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及进步为目的。这与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是一致的。而“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sup>[9]</sup>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是实行人道主义的重要途径。

何谓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中形象地解释,美是普遍存在的,“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美的事情总是可以与人共享的,而且它不因时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美是超脱的,“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sup>[10]</sup>。美的存在超越于

人的私欲与功利的目的。

感情的陶冶源于美育,而高尚道德的养成离不开美育。美育在“五育”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前文曾经阐述过,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是以现世幸福为目的的,属于现象世界的,而美育与世界观教育是属于实体观念世界的。蔡元培认为,“现象世界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而美的普遍性与超脱性可以克服这些障碍。“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美育“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sup>[5]</sup>,换言之,美育是“五育”中的“桥梁”,是实现蔡元培终极教育理想——世界观教育的根本途径。

## 2. 践行美育

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不仅仅是美育的积极倡导者,更是践行者。在北大校长和大学院院长任职期间,他一方面演讲、撰文并讲授美育课程,为美育确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发起、组织、支持美育实践。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第一所艺术高等教育机构成立。

蔡元培到处演讲宣传美育的重要性,他有关美育的演讲不胜枚举。如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做的主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1918年4月15日,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的演说;1920年5月,关于“美育的起源”的演讲;1921年在湖南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美术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1930年12月,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以美育代宗教”;1931年在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之书画”的论文。1921年秋,蔡元培在北大开设了美学课程,并写了相关的课程讲稿。这是中国高等学校美学课程的开端。

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制定了一系列教育规程,如《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明确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规定各级学校艺术课程的内容。在中小学设置音乐(或唱歌)、美术(或图画)、手工课程。

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组织设立了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戏剧



研究会等。他亲自为各研究会所创办的《绘学杂志》《音乐杂志》等杂志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1922年，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设本科、师范科、选科三种，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

1927年11月，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第一所音乐教育学校——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亲自担任院长。一个月后，在他的倡议下，“创办国立艺术大学提案”获得通过。1928年4月9日，在杭州设立的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由林风眠任院长。

## 二、现代大学的奠基者

蔡元培曾经有五年的德国留学经历，显然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出于对德国学术和教育的向往，蔡元培立志去德国留学，如他所说，“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sup>[11] 393</sup>。1907年7月，年近40岁的蔡元培到达德国首都柏林，开始其自费留学生活。

在德国的第一年，蔡元培主要学习德语，第二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在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 und Universalgeschichte）修课读书，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莱比锡大学的4年中，蔡元培埋头读书，广泛涉猎，平均每学期选修6门课程之多，课程内容集中在德国史、哲学史、艺术以及文学和心理学等方面。<sup>[12] 343</sup>从他所修课程可以看出，蔡元培并不追求一种专业的训练，并不在意获取学位，而旨在扩大学术眼界，深入了解德国乃至西方的精神世界，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寻求答案。

蔡元培在德国接触到了一流的学者，比如历史学家兰普来西（Karl Lamprecht）、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等教授，在哲学、历史与艺术等学科领域打下了广泛的知识基础，开阔了学术眼界。同时，他对德国的大学理念和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当时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教学与科研活动有亲身的体验。这些为蔡元培日后执掌北京大学，改革北京大学，无疑奠定了最好的基础。蔡元培虽然在赴德国之前在中国也有办学的经验，也深谙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传统，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在德国沉浸学术、深入考察德国大学、广泛接触学术前沿的经历，他在北京大学所提出的大学和学术理念与改革方案

是不可想象的。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在最初的约20年中，这所新式的最高学府一直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在学术和声誉方面也颇遭诟病。蔡元培之所以毅然接手“声名狼藉”的北京大学，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北京大学很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仅仅用了三五年时间，新的大学理念、新的学术理念、新的学术管理模式、新的知识分子道德形象便成为北京大学的标识，影响波及全国。可以说，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为当时的中国大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此后几十年中国的大学与学术发展无不受惠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因此，蔡元培堪称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者。

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人，其贡献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体系；第二，初步确立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这两个方面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互为表里，构成中国现代大学的两大支柱。

### 1. 现代大学的理念体系的建立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最初是从模仿西方开始的，产生于现实的实际需要，比如对外语人才或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在19世纪后半期的几十年中间，这种模仿主要侧重可见的制度组织和课程设置方面，甚至到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搭建高等教育的制度构架仍是主要任务。在知识层面，中学和西学相互冲突，彼此隔阂尚十分显著。大学制度的基本价值和理念问题尚未提出。直到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才明确提出了大学的理念问题。蔡元培的改革为新式的大学注入了一套基本的理念，使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新的大学理念体系可以概括为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救国等核心原则。

强调学术的至上地位是蔡元培大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他在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sup>[13] 35</sup>因此，教师应该是“纯粹之学问家”，学生则应该“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sup>[14] 311, 150</sup>蔡元培不遗余力地强调，大学应当远离官场和商场，教授们和学生应当摆脱世俗的名利追求，不把学问当成获取职业资格的手段。他的目标是，把北京大学从“官僚养成所”变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在蔡元培看来，纯知识应该是不涉及功利的，不以

实用为目的,换句话说,大学中人就应为知识而知识。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和学术,其目的首先在于要确立大学和学术的独立价值,这不仅是针对晚清的功利主义知识观,同时也是针对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实用主义知识观而提出的,其意义重大。在他看来,学术本身的价值与学术的社会地位,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大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学术自由在蔡元培看来是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他明确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原则,并论证道:“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sup>[15]271</sup>就是说,学术有其自主性和本身的规则,即“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承认知识之外的权威,这与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sup>[16]211</sup>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在兼容并包的方针之下,北京大学一时聚集了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虽彼此争论或冲突,但都有进行各自研究和教学的自由,形成了很好的学术发展氛围。可以说,蔡元培打破了一家独尊的学术传统,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碰撞与交锋提供了可能,为开阔学术界乃至文化界的视野提供了条件,为学术研究和知识的传授提供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空间。这种在北京大学校内的思想与学术自由,当然也扩散到校外,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五四”精神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蔡元培看来,学术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根本所在。他初任校长时,就透露说,“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以使吾国转危为安”<sup>[17]26</sup>,还援引当年普鲁士的例子,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sup>[18]26</sup>,显然希望通过北京大学的改革,达到国富民强的远大目标。正如他的老朋友吴敬恒所说,蔡元培“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了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般人即可以之而尊”<sup>[19]26</sup>。蔡元培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清楚地表露了他的这种学术救国的思想。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sup>[20]479</sup>

如果说,学术至上和学术自由强调的是大学本身的信念和价值,学术救国则是大学更基本,

或者说更宏大的使命。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使命感,使蔡元培能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大学的改革,赋予大学改革以更丰富的内涵,更宏大的目标。

## 2. 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的确立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除了观念层面的革命外,也带来了学术制度层面的革新。学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否则,再新的观念和思想也难以落实。因此,蔡元培在倡导观念革新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致力于相关制度的建设。

蔡元培深知,要把北京大学变成为学术的场所,让大学教师和大學生变成研究者,必须有相关的制度保障,而研究所就是这种制度保障之一。以前的北京大学没有研究所,大学教师的任务无非是教学,工作场所就是教室,大学并不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进行研究的场所。而蔡元培上任的第一年就着手建立研究所,1917年底,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和法科研究所相继建立。1920年又公布了《研究所章程》,对原有的研究所进行改组。但限于条件,最终于1922年建立了国学门。根据《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凡北大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乃至未毕业之学生及校外学者曾做特别研究,且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国学门研究;已毕业的学生及校外学者亦可报名做通信研究。北京大学的教师也可以自由入所研究,并主动提出问题,召集研究生入所指导其研究,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国学门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文科的研究,研究所这种形式也广为后来不少中国大学的效仿,如东南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5)、厦门大学(1926)及燕京大学(1928)等都建立了类似的国学研究机构。

学术刊物及其审稿制度是现代学术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深知学术刊物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前,中国鲜有学术刊物。在改革北大的同时,蔡元培认为大学作为学术的场所,不仅应当有研究活动,而且需要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呈现和交流形式。在他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蔡元培亲自起草了《月刊》的发刊词、征稿启事,以及聘请编辑通知和出版合同,明确《月刊》是以刊登学术论文为主的学术刊物。值得注意的是,《月刊》规定,“稿之内容,属某学科,请先送本学科研究所主任

处。由主任汇集，以送于编辑者<sup>〔21〕</sup>。这种制度化的评审过程对于明确学术标准、提高学术研究水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1922年，随着研究所的改组，《月刊》为更为专业的四种学术刊物所替代，即《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学季刊》。其中《国学季刊》影响甚大，成为全国性的国学研究刊物。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下，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还创办了若干学术性刊物，其中学生的刊物《新潮》（1919）和《国故》（1919）影响最大。这些学术刊物以一种制度性的方式，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支持，而且提高了学术研究的地位。正如吕思勉所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研究，才不为众人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sup>〔22〕</sup><sup>543</sup>

蔡元培不仅重视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的建设，同时也很强调学术团体的重要性，将其看作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另一种组织形式。蔡元培亲自找学生，手把手地教学生们组建自己的学术团体和组织。他自己参与若干团体的筹建工作，参加了新闻学会、经济学会、史学会、新闻研究会等会的成立大会，为学术演讲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团体撰写章程。在蔡元培的示范和鼓励下，北京大学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性的组织，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化学会、考古学会等。这些团体的成员并不限于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更面向校外的专家学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专业同仁学术交流的功能。作为学术制度的组成部分，学术团体这种形式在北京大学逐步走向成熟，对于形成专业的学术探讨空间，推动专业知识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三、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缔造者

蔡元培一向注重学术研究。民初任教育总长时，他草拟了《大学令》，将通儒院改为大学院，在大学中设立研究机构。但直到他掌北大校长之职，中国的大学始有真正的研究所。蔡元培也曾为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机构的书院的消亡深感惋惜，他写道：“我们从前本来有一种专研国学的机关，就是书院。……清季，输入欧洲新教育制度，竞设学校，全国的书院，几乎没有不改为学校，于是教授的机关增加而研究的机关就没

有了。”<sup>〔23〕</sup>

蔡元培并不是第一个提议设立国家级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1913年，马相伯在担任袁世凯政府顾问时，就曾提议仿效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aise）设“函夏考文苑”，但未能实现。其原因除了与民初的政治环境有关外，还与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水平较低、学术研究基础薄弱有关。<sup>〔24〕</sup>1924年冬，孙中山曾拟设立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以立革命建设之基础。他命汪兆铭、杨铨、黄昌谷起草计划。但因其病逝而流产。<sup>〔25〕</sup>

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这是继民初任教育总长后，他再次执掌中央教育行政大权。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尽快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蔡元培认为国家有必要建立学术研究机构。5月9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设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的提议，并与李石曾、张人杰等被推举为中研院筹备处筹备委员。11月20日，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30人，召开中研院筹备会。1928年6月9日，院长、总干事及各单位负责人在上海东亚酒楼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宣告中研院正式成立。中研院的成立标志了国家级的科学研究体制的形成，其宗旨是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坚”<sup>〔26〕</sup>。这意味着国家学术研究重心开始由大学转向官办机构。

蔡元培意图将中研院建成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1922年，蔡元培等人联合发表了《教育独立议》的文章，指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sup>〔27〕</sup><sup>586</sup>中研院最初隶属于大学院。1927年6月13日，国民政府通过了设立大学院的提案，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学院院长。大学院下设中研院。院长由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1928年10月，蔡元培辞去了大学学院院长之职，国民政府旋即改大学院为教育部。中研院从此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并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

中研院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这也归功于院长蔡元培的努力。《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设院长一人，特任。综理全院行政事宜。其余人员均由院长聘用。<sup>〔28〕</sup><sup>556</sup>中研院设立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责有五方面：（1）决定中研院研究学术之方针；（2）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3）中研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推举院长候补人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



(4)选举名誉会员;(5)接受国民政府委托的学术研究等。<sup>[29]</sup>上述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中研院的独立性。

中研院的核心职责有二。一是实行科学研究。中研院初创时正值最艰难的战争时期,因此,在研究取向的选择上也注重研究“立见功效”和“直接应用”。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中指出:“凡科学发达之国家,皆可于应战时召集其国内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临时变作为国家军事技术服务之人,本院同人准备于如此机会之下,用其技术的能力,尽其国民的责任。在准备过程中,本院之个人及集体,自当随时应政府之需求,供献其技术的能力。”<sup>[30]</sup>二是肩负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的职责。具体而言,“对于向我们咨询专门问题的人,我们当然有指导的责任,对于在学术界有重要发明或贡献的本国学者,我们有时亦认为有奖励的义务,对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研究机关,我们更觉得有联络的必要”<sup>[25]</sup>。

注重科学方法是中研院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 发刊词》中写道:“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sup>[27]</sup>159-160 蔡元培为他人著作写序时,曾多次引述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故事说明此意。他认为:科学的结论,是点成的金,量终有限;科学方法,是点石的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因此,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蔡元培一贯尊重科学研究的自由精神。他在中研院的内部治理坚持“学院自由”,在《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中指出:“在院内实行与已设研究所有关各科学之研究,一面权衡各项科学问题之轻重,以定进行之程序,一面充分顾及所谓‘学院的自由’。”所谓“学院的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制限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sup>[30]</sup>315。在指导、奖励学术研究时,蔡元培认为中研院不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统治”一切研究。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一文中,他写道:“我们虽是最高的研究机关,但决不愿设法统制一切的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能利用他的地位,时时刻刻与

国内各种机关联络交换,不可以阻止旁人的发展,或是用机械的方法来支配一切研究的题目,这是本院成立以来一贯的方针。”<sup>[31]</sup>173

在蔡元培主持时期,中研院共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和动植物十个研究所。所聘请的主持所务或负责专题研究的学者又是国内各个领域的专家,如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等。1935年9月,第一届评议会正式成立,聘任评议员30人,当然评议员11人,共41人。院长和各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包括:李书华、叶企孙、秉志、胡先骕、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胡适、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从当选的评议员的背景来看,国内当时主要的研究机关,如国立北平研究院、北平事业部地质调查所、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以及北大、清华、燕大、协和、中央、中山、浙大、南开和武大等高等学府均有代表。因此,中研院可谓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的精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及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也在其列。

蔡元培从初创到辞世一直担任中研院院长,任职长达十三年之久。虽然中研院经费并不充裕,但是在他的大力扶持和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中研院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史语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字、石器、铜器、陶片、骨器等,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考古重大事件;地质研究所对长江下游笔石化石、第三纪与第四纪腹足类化石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天文所建成了紫金山天文台;等等。

中研院注重科学研究本土化,积极向世界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使欧美国家的学术界对中国的科学研究有所了解。1932年3月,法兰西学院以白里安奖金赠送中研院;1934年7月,波斯的亚细亚学院聘请中研院为名誉会员。由此可见,中研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世界的瞩目。

#### 四、结语

蔡元培积极努力发展中国现代教育、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他“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其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学识广博。蔡元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中长大的,是清末的

进士翰林，后又留学德法，研习西方学术，融古今中西学术于一身，为民国教育及北大的改革确立了远见卓识的发展目标。其二是举贤任能。无论是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还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都能够挑选纯正有为并具领导力的人做助手，如教育次长范源濂和北大蒋梦麟。翁文灏在总结中研院成功的原因时指出：“蔡元培自身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总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均各能行其应有职权，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sup>[32]</sup><sup>[278]</sup> 其三是人格魅力。顾孟余曾回忆道：“先生之施教，

不限于知识，其感化力乃在其伟大之人格。先生处世接物，惟以衷恕，持身廉洁，事不居功，故不言而众服。其感召青年以此。”<sup>[33]</sup><sup>[158]</sup>

概言之，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民初他倡行美育，以期涵养高尚道德，提升人生价值，定美育为国家之教育宗旨，开启艺术教育先河；革新北大，力倡学术自由之学风，民主治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中研院，集中国家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研究人才，促进学术合作与交流。蔡元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与科学研究的建制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成功的实践经验以及丰富的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

- [1] 蔡元培. 自写年谱[M]//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 蔡元培. 在天津车站的谈话[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3] 蔡元培.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M]//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4] 蔡元培.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M]//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5] 蔡元培.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M]//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6] 蔡元培. 世界观与人生观[M]//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7] 蔡元培. 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M]//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8] 蔡元培. 美育[M]//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9] 蔡元培. 哲学大纲[M]//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0]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1] 黄炎培. 吾师蔡子民先生悼词[G]//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纪念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12] 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13]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4] 蔡元培. 复吴敬恒函，读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5] 蔡元培.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6] 蔡元培.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7] 蔡元培. 致汪兆铭函[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8] 蔡元培. 复汪兆铭函[M]//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9] 吴敬恒. 蔡先生的志愿[G]//陈平原，郑勇. 追忆蔡元培.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 [20] 蔡元培.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M]//蔡元培全集：第五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1] 宋月红，真漫亚.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兼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术创新[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 [22] 吕思勉. 论蔡子民[G]//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纪念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23] 蔡元培.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N]. 北京大学日刊，1925-06-27.
- [24] 左玉河. 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J]. 社会科学研究，2007，(2).
- [25] 陶英惠. 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期)，1978，(6).
- [26] 蔡元培.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M]//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7] 蔡元培. 教育独立议[M]//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8] 蔡元培. 中央研究院组织法[M]//蔡元培全集：第十八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 29 ] 张剑. 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 J ]. 史林, 2005, ( 6 ).
- [ 30 ] 蔡元培. 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 M ]// 蔡元培全集: 第八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 31 ] 蔡元培. 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 M ]// 蔡元培全集: 第八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 32 ] 翁文灏. 追念蔡子民先生[ G ]//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纪念集.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 33 ] 顾孟余. 忆蔡子民先生[ G ]//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纪念集.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责任编辑: 罗雯瑶 ]

## Cai Yuanpei: The Founder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CHEN Hong-jie   CAI Lei-luo

(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 CaiYuanpei advocated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all his life. As the first Minister of Education, he strongly advocate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tremendous changes took place and it w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university. As the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isted on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freedom. In a word , Cai w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education of China due to his ever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 CaiYuanpei; aesthetic education; academic freedom; Peking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